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瑞典 与“第三条道路”： 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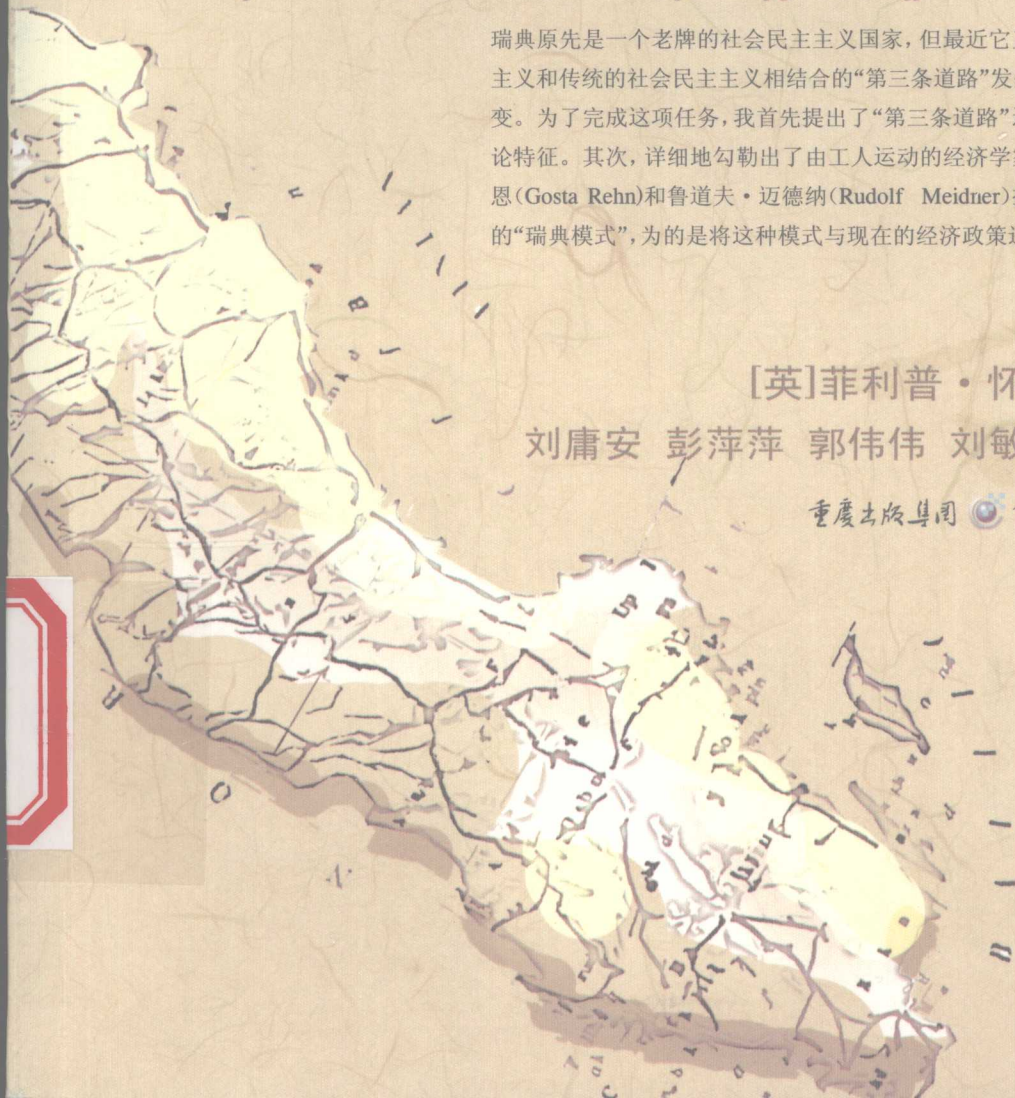
Ruidian yu "Disantiao Daolu": Yizhong Hongguan Jingjixue de Pingjia

瑞典原先是一个老牌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但最近它正朝着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发生着深刻的转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首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模式的理论特征。其次，详细地勾勒出了由工人运动的经济学家约斯塔·雷恩(Gosta Rehn)和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提出来的著名的“瑞典模式”，为的是将这种模式与现在的经济政策进行比较。

[英]菲利普·怀曼 / 著

刘庸安 彭萍萍 郭伟伟 刘敏茹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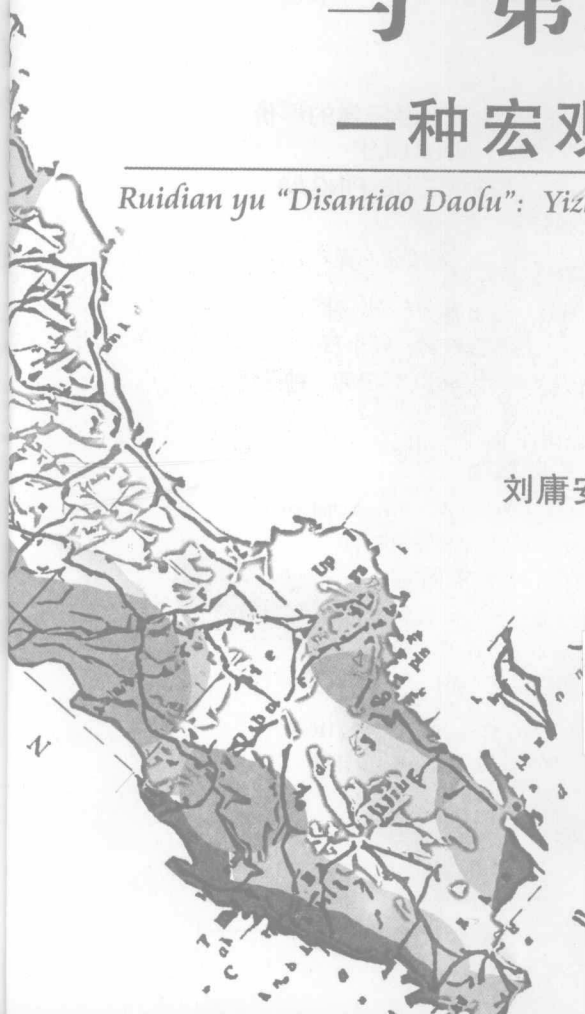
瑞典 与“第三条道路”： 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

Ruidian yu "Disantiao Daolu": Yizhong Hongguan Jingjixue de Pingjia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英]菲利普·怀曼 / 著

刘庸安 彭萍萍 郭伟伟 刘敏茹 / 译



Sweden and the "Third Way" by Jelle Visser and Anton Hemerijk

Copyright © Philip Why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艾斯格特出版公司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國大陸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5)第1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典与“第三条道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

[英] 菲利普·怀曼著; 刘庸安等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4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5366-9060-8

I. 瑞… II. ①怀…②刘… III. 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瑞典 IV. D091.6 D75.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9314号
版贸核渝字(2006)第3号

瑞典与“第三条道路”:一种宏观经济学的评价

RUIDIAN YU "DISANTIAODAOLU":

YIZHONG HONGGUANJINGJIXUE DE PINGJIA

[英] 菲利普·怀曼 著

刘庸安 彭萍萍 郭伟伟 刘敏茹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刘 玮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蒋忠智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10千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38.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总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同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19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

政。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趋势。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社

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 15 个成员国中的 13 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 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

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5种);1994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年12月25日

致 谢

我衷心地感谢很多人,因为在我准备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给了我很多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容忍我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我感谢克莱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的耐心;感谢芭芭拉为我校对了全部书稿并保证了我所列的参考书目的准确性——这证明两个人的脑子总比一个人的脑子好使。

我感谢柯斯廷·豪盖特和她在艾斯格特出版公司的同事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拖延中表现出来的耐心。我希望他们对这个最终产品感到高兴,并认为等待是值得的!

我还要感谢瑞典的研究所为我提供了访问资助金,这笔资助金使我得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背景材料。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职员工为我提供了有利于我进行这项研究的环境。我感谢乌洛夫·鲁因教授,他允许我成为他那个系的成员,感谢米歇尔·米舍莱蒂在这段时间担任我的非正式的导师。此外,我还应该感谢国家工作生活研究所,它的正式名称是工作生活中心,因为他们允许我免费使用他们的设施,并帮助我得到了最新的资料。

我必须感谢无数的受访者,他们在我在瑞典期间非常友好地接受了我的访问——他们的很多看法既弥补了我知识上的空白,又为我提出了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们向一个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表现出来的种种善意使我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还应该感谢菲利普·阿里斯特斯教授、穆雷·米尔盖特教授和布里安·博克特博士的指导和参与,特别是在这个项目还处在萌芽状态时的指导和参与。此外,我还要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书初稿提出的意见——其中一些意见极富洞察力,并且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文本中已经得到了改进。

尽管我得到了上述所有人的无私帮助,但是把所有引文从瑞典文翻译成英文还是我自己完成的。因此,在翻译和其他问题上,出现任何错误理由应由我负责。

我希望,我能够用使他们感到快乐的工作来回报他们的善意,希望这项工作将来会对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作出一点贡献。

菲利普·怀曼
于兰开夏郡,乔尔雷

序 言

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中,在一方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另一方是老式的凯恩斯主义—法团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开创“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为很多中左翼政党的政策纲领背后的驱动力。这“第三条道路”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以前版本,它拒绝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即总需求管理是一种成功的宏观经济战略的一个主要特征;相反,“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们往往关注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变革,目的是扩大自己国家在一个受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竞争优势,而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已经使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变得无能为力。

本书试图对“第三条道路”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做出批评性的评价,并根据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来研究瑞典的经验。瑞典原先是一个老牌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但最近,它正朝着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发生深刻的转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首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模式的理论特征。其次,详细地勾勒出了由工人运动的经济学家约斯塔·雷恩(Gösta Rehn)和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提出来的著名的“瑞典模式”,为的是将这种模式与现在的经济政策进行比较。再次,我逐一分析了瑞典宏观经济政策在内外两个方面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其中包括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后福特主义的技术变革和资本的授权,以便发现它们在何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自主权。然后,我分析了20多年来几届成功的政府的经济纲领,以便在宏观经济的立场上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作出说明。最后,本书的结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瑞典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看成“第三条道路”模式的一个变种,并考察了将“瑞典模式”的核心部分修改成替代目前流行的宏观经济纲领的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中文版序言

今天,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支配着经济思想和政策应用,这种传统在 80 年前就曾受到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所写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的重大挑战。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全球化的力量已经使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过时了。因此,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总需求管理——利用由一种“低利借款”(cheap money) 形式的货币政策所强化的反周期的财政措施——除了其最松散的概念之外,差不多被认为是过时了。由于重新信奉萨伊定律^①,控制通货膨胀已经取代了追求充分就业,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萨伊定律假设,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如果不受到使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的妨碍,那么,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往往会朝着市场清算和充分利用所有资源的方向发展。简言之,现在不需要凯恩斯的经济学,它在当今时代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1976 年发生在英国、1982 年发生在法国,以及 1990 年发生在瑞典的事件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不过,这给社会民主主义(中左翼)的、进步的政治运动带来了严重的两难境地。新自由主义时期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扩大了经济的不平等,并大幅度提高了失业率。实际上,即使是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除了极少数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以外,失业率一直在 5% 以上——而且如果考虑到因提前养老和丧失工作能力而出现的“隐形失业”,这个数字还将大大提高。此外,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上“受到偏爱”的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代价却是经常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备受折磨的国家出现严重的不稳定。这些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在凯恩斯时代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感到绝望的失败。

^①萨伊定律(Say's Law)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 年)提出的一种经济学说。该学说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因此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在凯恩斯经济学说之前,该学说一直被正统经济学奉为最基本的信条。——译者注

尽管有这种令人沮丧的记录,但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的左翼从一开始就为提出它认为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替代选择而奋斗。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美国,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英国的当选才获得人们信任的一种反应,涉及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经济模式。实际上,这种方法在选举中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衡量,即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不是联合执政就是单独执政,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第三条道路”的影响。这种现象甚至使美国的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选为“年度人物”!

然而,“第三条道路”不只是使中左翼政党执政(或重新执政)的一种实际手段。它代表着在重点和理论基础这两个方面都不同于比较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转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即宏观经济战略是建立在积极的总需求管理基础之上的;相反,“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种供应学派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这是一个容易混淆的词)经济学的结合。特别是,这种经济学认为,全球化已经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政府应该设法改变制度、规则和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以适应这种新的现实的要求。这样,通过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了宏观经济战略的支柱,而且必须通过平衡跨经济周期的预算来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另外,还要使国际金融市场相信,没有必要对长期利率给予风险贴息,这样就可以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取消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英国工党的首相就可以夸口说,在欧洲,英国是对劳动力保护最少的国家。为了提高生产率,要对公共部门实行市场化,同时,为了提高工作参与程度,应该向个人提供刺激,并加强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建设。

“第三条道路”模式在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一直是受到批判性分析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经济学》(*“Third Way” Economics*, Palgrave, 2006)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过,《瑞典与“第三条道路”》(*Sweden and the “Third Way”*)是想通过详细考察瑞典这个个案,向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表示敬意。瑞典对于这种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瑞典在社会团结和经济成功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断使世人对进步充满了信心。但是,尽管“瑞典(雷恩-迈德纳)模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为了应对来自外部因素,比如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最近几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采取了很多与

“第三条道路”的方法有关的政策。因此,瑞典对研究“第三条道路”究竟是当代条件下在一条新的道路上实现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还是一条削弱提出一种新的进步的政策纲领的必要性的错误的“死胡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聚焦点。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会吸引对与瑞典经济有关的特殊环境特别感兴趣的读者。

首先,关于瑞典的个案研究突显了认识自由市场制度所固有的局限性的重要性,这种制度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以引导和形成资源的配置,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效益的分配。尽管市场是配置稀缺生产性资源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但市场是不完善的。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在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中出现的大规模的失业,对那些坚持下面一种理论立场的经济学家是一个相关的提示。这种理论立场就是,经济往往是朝着资源几乎是瞬间得到充分利用的方向发展的。同样,因不受控制地依赖市场力量而引起的环境破坏导致了工人可怕的生活条件,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方工业化经济。因此,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中,干预是必需的,更何况,很多人现在还遭受着环境和社会条件恶化的同等折磨。

很多有影响的机构都对反对国家干预的假设深信不疑,其中包括很多其决定甚至对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会产生影响的国际经济机构和金融市场。一个例子涉及到那些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正处在从一个很大程度上说是以国家为导向的经济制度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的过渡时期,它们在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幼稚性,因此在转变过程中经历了相当剧烈的经济混乱。一个比较聪明的委员会应该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指出,市场经济不会,甚至在大部分时候不会表现出迅速而顺利地朝着充分利用它们的资源的方向转变的趋势。实际上,即使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也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

经济发展的“亚洲模式”已经证明,在某种情况下,明智而审慎的国家干预对经济的表现是有利的。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不应该受到那些不受欢迎的经济规则的干扰;必须根据证据,而不是根据教条来制定政策——凯恩斯在《通论》的结束部分就是这么说的,至今还令人难忘。如果审慎地运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工资谈判协调机制,这种政策和机制就将有利于提高经济生产率和保持低水平的失业率,而金融管制对于防止因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而出现的资本自由流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解除金融管制使先是过热，随后又在短期内对一种令人骄傲的经济进步的记录造成破坏的资本流动变得反复无常——的经验所证明的一样，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对于防止因投资者的态度发生突然变化而造成民族国家的经济混乱是必要的。

我希望本书吸引中国读者的第二个特点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特定的国家环境中出现的，它通过一定的制度框架和转换机制转变成实践，而这些框架和机制是不容易被复制的，即使试图进行这种复制是可取的。经济参与者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参与经济活动的，所以很难准确地预言这些行为也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因此，毫无疑问，“瑞典模式”有其读者赞成的一面，但它不可能成功地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框架中去。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曾试图通过人力资源服务委员会的形式把瑞典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引到英国国内来；从理论上说，这样做是可行的，但英国没有像瑞典一样的社会环境，在瑞典，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因政府的不断支持而得到好处，也为社会伙伴所接受，而且它是范围更广的雷恩-迈德纳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尽管从比较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原则，但采取这些思想中的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还是很成问题的。

国际比较分析可以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可以鼓励在战略回应方面的创新，但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根据头脑中的本国的具体特征来设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本书包括的一些思想可能只是在某些小的方面有助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必须经过特殊的设计，以适应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它的目的。

最后，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本书中文版译者，以及英国艾斯格特出版公司和中国重庆出版集团的出色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我唯一的希望是，你们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像我在写本书时一样，感到愉快并有所收益。

中兰开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菲利普·怀曼

目 录 Contents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总序 /1

致谢 /1

序言 /1

中文版序言 /1

第一部分 理论背景

第一章 对“第三条道路”的考察 /3

第二部分 传统的“瑞典模式”

第二章 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础 /25

第三章 雷恩-迈德纳模式 /41

第四章 第二阶段的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 /62

第五章 工资争取者基金：第三阶段的凯恩斯主义 /76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回归未来 /100

第三部分 是范式转换吗？

第七章 全球化与国家经济自决	/127
第八章 欧洲一体化与“瑞典模式”	/144
第九章 技术变革与瑞典雇主联合会的进攻	/165

第四部分 对可替代的宏观经济战略的评价

第十章 是一个“瑞典的新开端”吗？	/187
第十一章 “新”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206
第十二章 是通向“第三条道路”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吗？	/228

参考文献	/247
索引	/299
说明	/307